

旧石器时代 人类起源阶段的人群迁徙与技术传统

河南境内旧石器遗址多分布在豫东、豫西南山地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带，主要涉及三门峡盆地、伊洛河流域、嵩山东麓、平陆川地区、南阳盆地等。大量不同行业类型和不同文化阶段遗址的发现，使该地区建立了较完整年代框架。

河南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2处，发现的人类化石有“栾川人”“浙川人”和“南召人”，所处时代与“北京人”相当，均属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直立人范畴。文化面貌整体上与我国南方砾石工业有很多相似性，同时与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等为代表的我国北方小石片工业有一定相似性。由此可见，河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在与南方砾石工业人群进行交流的同时，也保持着与我国北方小石片工业人群的文化交流，体现了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特色。

距今约12万—5万年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许昌人”头骨距今10.5万—12.5万年。这一阶段的古人类化石，河南仅此一处。“许昌人”头骨上内尔速路模式与许家窑人极其相似，有典型尼安德特人的特征，说明两者存在一定的人群交流。从石器工业类型也能看出，许昌人遗址与湖北斧斤子、许家窑遗址之间具有一定差异，但呈现出较多的相似性，并与欧洲安德德特人所创造的莫斯特文化相比，表现出明显文化差异。

从年代划分上，河南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许昌人遗址、汝州温泉遗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和浙川坛南遗址等。整体上來看，河南地区这一阶段遗址的文化面貌仍保留有我国南方砾石工业的文化因素，但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而小石片工业所占比例增加，石器加工技术较早也有所进步。同时，还出现了更为先进的阿舍利技术，许昌人也出现了具备精准控

裴李岗时代 “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分布于中原地区的核心考古学文化。年代为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裴李岗文化以豫中豫东山地为中心，东到豫东的周口店城，西到三门峡，南抵信阳潢川，北至湖北安陆，分布范围十分广大。目前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有106处。重要遗址有新郑裴李岗、沙窝李、唐卢、郑县水泉、长葛水泉、舞阳贾湖、安阳八里庄等。

裴李岗文化特征鲜明，发展程度较高，已经有了完备的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过上了农业定居生活，农业生产性别分工出现，裴李岗遗址已经显现。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内装石子的鱼甲均经鉴定为祭祀器具，加之丰富的祭祀坑，反映出浓厚的祭祀文化。贾湖骨笛多为七孔，制作精美，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器，改变了世界音乐史、出土陶片上附着的沉淀物中含有酒类发酵后产生的酸，实验研究的化学成分与现代裴李岗葡萄酒相同，刻划符号提供了早期文字的线索。裴李岗文化所代表的文明就是整个东亚文化发展的“高地”，因此这一时期被学术界称为“裴李岗时代”。

仰韶文化时期 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涉及10余个省区，延续时间长达两三千余年，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发展阶段。在其广阔分布区内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称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体系或文化系统，内涵极其丰富，同时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主体性文化。在所处史前文化中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是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前文明化发展格局的“花心”。

双槐树等遗址的材料表明仰韶中晚期已经初步进入了文明社会，仰韶文化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有学者指出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仰韶文化初期和中期中原与周边地区存在着文化交流与互动，如下潘旺类型的陶釜在崑山文化中找不到源头，应来自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有学者指出北辛文化的向西扩张对下潘旺类型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半坡类型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对周边地区积极施加影响。豫西南南地区的东庄类型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半坡类型的较大影响，同时对半坡类型亦反向输出文化影响，而东庄类型的鼎盖是受到仰韶类型的影响。后岗类型文化发展亦较强势，分布范围较之前的下潘旺类型明显扩大。除分布于湖北和豫南地区之外，其文化因素进入晋中北地区，并将该地区的夹砂红陶文化、同时后岗类型与东边海岱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河北北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区亦能見到仰韶文化因素。此外，豫西南地区八里岗类型与南阳汉江地区之间也有一定的文化联系。

仰韶中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对周边文化有着极其强烈的辐射与影响。大汶口早期文化中明确源自仰韶文化的陶器器形主要有敛口彩陶钵、卷沿曲腹彩陶(素面)盆、敛颈折肩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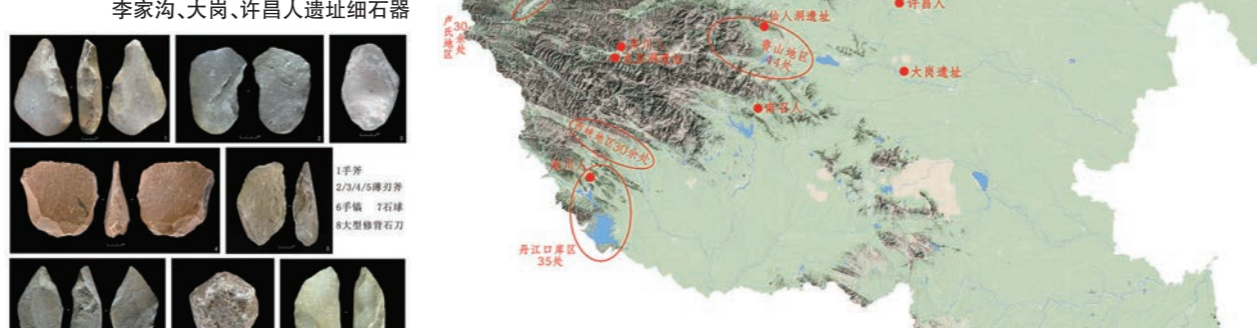
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文化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和夏王朝建立

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之后进入了龙山时代。现有材料表明，河南的龙山文化已进入到磨石铲并用时代，二里头文化已進入青銅時代，即为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夏文化遗存。而河南的龙山文化晚期可能已是夏文化的早期遗存。

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明显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段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等同时期的遗存；晚段即郑州王砦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陶寺台文化、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等同时期文化的遗存。

龙山时代早期阶段是中原地区文化与社会复杂化在前期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亚阶段。这一时期，大汶口文化强势西进中原，占据豫东地区，晚期向西部可达济颍河流域地区，形成了大汶口文化迟滞型势力带；豫东另一石家河文化向北抵达南阳、信阳和驻马店一带，豫南地区则进入了江汉文化系统的影响力范围。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和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主要继承本地仰韶文化的基础上，糅合或吸收了周边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吸收和借鉴了周边其他文化因素。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此时的农业、畜牧业获得了稳定的大发展。家畜饲养除除了生活占主要地位的猪之外，牛、羊也进入了中上层人群的生活。平粮台城址发现的车辙，说明在距今4200年前人们已经发明了新的运输工具，大大提高了运输的能力和效率。布局清晰、规划明确的城址和聚落说明“邦领”“公共事务”权利的加强。叶县余庄遗址发现的大型



罐器座等。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彩陶艺术，主要是在此时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大溪文化北临仰韶文化，两种文化以汉江作为交流通道。由于两种文化发展水平都较高，因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相互的，但整体上来看，仰韶中期文化对大溪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出现的白衣陶器和圆点勾叶纹、花瓣纹、鸟纹、垂帐纹、叶形纹、弧边三角纹彩陶纹饰，陶器中出现的双唇小尖底钵、圆、圆底釜、红陶钵等，应该都是仰韶文化南下的产物。

中原仰韶中晚期文化彩陶艺术对南方长江下游薛家岗、崧泽文化和北方地区红山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与影响。如见于上述地区的弧边三角纹、花瓣纹等彩陶纹饰，应是受中原地区彩陶文化影响产生的。红山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某些陶器型制也能明显看到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

仰韶晚期文化内部分化逐渐加强，同时受到周边



年的积淀和发展，中原龙山时代在“邦国”的末期或许已经迈进了“成熟陶器”的门槛。

总体上看，中原龙山晚期文化复合体在这一阶段不再像龙山时代早期那样固守本土，而是在一些方向上开始了向外的“扩张”过程。比如新生的沱冶文化取代大汶口文化新期的迟滞型类型，占据了豫东地区，使得这一区域重新回到了中原文化系统的势力范围。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与涿鹿之战有关；王湾三期文化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加，在晚段强势南进，驱逐了当地的石家河文化。伴随着“禹征三苗”的历史事件，将南阳、驻马店和信阳等区域再次纳入中原。龙山时代早期南、北方间的攻守关系在此阶段呈现反转，体现的正是龙山时代晚期中原文化蓬勃的发展力。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内部交流频繁，并不断地接受周边的文化影响。造冶合金和后岗二期文化中出现的斜纹灰陶鬲、子母口陶器等明显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三里桥文化中出现的扁体单耳罐、双耳深腹罐、罐形器等都是客省庄文化常见的器类。经过了约200年的发展，到了夏代之前，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动静逐渐加重，重新以强势迅猛崛起。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影响范围空前。

二里头文化初期形成“金字塔”式聚落结构；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邑，周边分布着东下冯、大冢遗址、东赵、史国缘、濬城遗址、八里桥等拱卫都城的二级城邑。控制着其他中小型聚落。二里头遗址新发现多条道路，把遗址分为多个小型、规整的网格区域，宫城区居于核心，突显宫城区的核心地位，反映出社会阶层、等级划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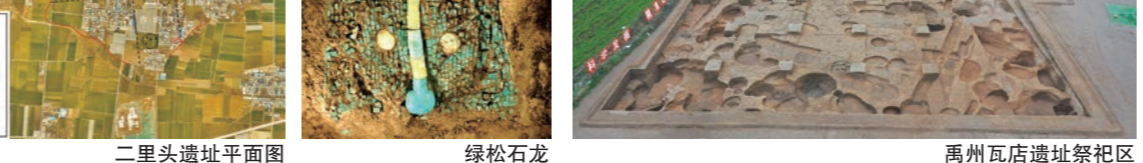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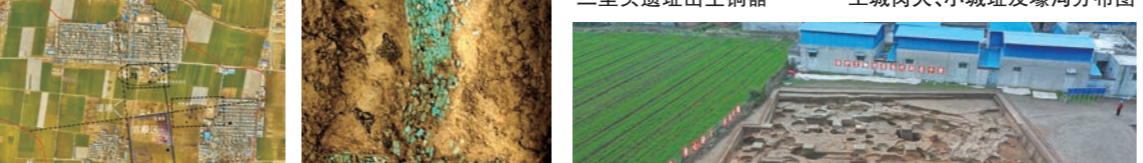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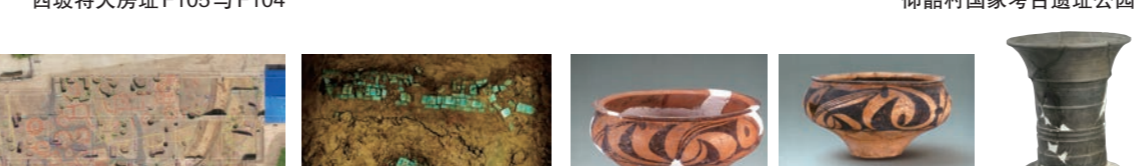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建院70周年

中原与周边

——中华文明的融合与发展

中原本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又称中土、中州。华夏，考古学上的中原一般是指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横跨中国地形的第二、三阶梯，包括了黄土高原南部、华北平原以及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广大地区，区域内有黄河以及重要支流渭河、汾河、伊洛河等贯穿其中，交通方便，地貌类型以河谷平原和黄土台塬为主，土壤深厚，土质疏松，适宜于早期农业的开展耕作。本区域大部分位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降雨充沛，雨热同期，十分适宜于发展农业经济。中原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都城数量最多的地区，长期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研究的关键区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考古文化从未间断，文化发展不论是高潮或低潮、始终与周边地区进行着文化交流与互动，取长补短、创新发展。



商文化时期 青铜文明鼎盛阶段的文化格局

继而复兴的商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背景下，经过文化格局的变动和政治构架的形成，奠定自己在华夏文明早期发展阶段中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城市的繁荣、文字的成熟和青铜铸造的发展等方面。商代遗址数量众多，有学者可将商代聚落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全国性中心聚落、地区性中心聚落、大型村落和村寨。包括考古学确认的商代城址数量较多，多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以中原地区分布为主。从早商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中商的郑州商城至晚商的安阳殷墟，商代的都城重心虽有所转移，但均位于河南范围内。周边的城址则有自身的职责和功用。整个商一代，商王朝以其强大的凝聚力 and 辐射力，将其都城及臣聚团聚在周围，周边遗址如众星捧月般的守护着王朝的统治，为商代的稳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从早商时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到商朝中期小双桥遗址陶文的少量发现，到商朝晚期安阳殷墟陶文、金文、玉石器文字和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体系的成熟，表明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文字体系逐渐形成。吴城遗址、老牛坡遗址陶文的发现，体现出中原地区与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融合与交流。

商朝中期发现的青铜器数量极丰，青铜作坊遗址或与铸铜有关的遗存亦比较多。尤其是在晚商青铜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之外亦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有学者根据商代青铜器超出同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这一现象，提出中国青铜时代存在一个“礼器文化圈”。青铜礼器群在商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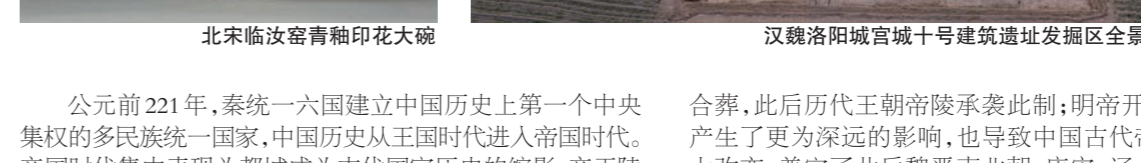
周王朝时期 王权国家巩固阶段的文明形态

殷周鼎革，中国历史进入西周时期，在周王朝的政治文明框架中，以“宗周—成周”为中心规划四方体系，何尊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周天子居天下之中“成周”，依五体系，由内而外邦国内、邦外、诸丑，最外围为蛮夷，戎狄，不同圈层因对周王承担的义不不一样而与政治地位挂钩。

作为当时两大族群，周人在政治上强势、物质文化落后，而商人恰好与之相反，且殷商人数量相差甚远。如何处理后口庞大的殷遗民，学习文化发达的殷人，通过管理扩大商人的疆域，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周人通过分封制、宗法制、制定礼乐规范，完成了天下归周、归心，整合了新建立的核心内容。周人从北方文化因素引入了包括青铜、马车挂件车马具；北方文化因素还包括牛、兽首在内的各类刀、长剑、剑、管箫、短剑，有象牙体刀，也输入周人兵器谱中；来自经西北传过来的杖头刀依旧保持着高身份地位象征；也包括了鬲形瓷、甗等日用器物。

周幽王时期，大戎攻陷周都，周平王被迫东迁丰镐之间两周。这是西周中晚期周边族群对中原文化造成的极大震动，华夏之辩愈显突出。东迁后的周王室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对各个诸侯国的约束力急剧下降。中原文化内各诸侯国独立性加强，形成中原文化圈下的亚文化，彼此展开了对内与对外的全面竞争，政治先后各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文化上礼乐崩坏、诸子百家。中原固围，中原与周边诸国的碰撞纵横，中国历史进入了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时画面。吴越、荆楚、齐、郑等周边民族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崛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或诸侯土著特色青铜礼器，这表明其已掌握了一套制作青铜器的工艺，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繁荣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历史从周代时代进入帝国时代。帝国时代集中表现为都城成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帝陵墓则成为历代王朝“国家文化”在地下世界的缩影，“陵墓若都邑”“生死如生事”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秦帝国短暂，中原地区在深受秦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面貌仍保留自身浓厚的文化传统。中原地区秦墓葬俗呈现多样性特点。豫西三门峡地区因临近秦文化核心区，表现出与关中较强的—致性。如三门峡秦墓多为陶室墓，使用屈肢葬，随葬漆木器等陶器。洛阳、郑州与新乡为中心的三晋两河文化所发现的秦墓多有洞室墓葬形制，随葬器类、随葬漆、金、铜以及铜头漆等日用陶器。在南阳、驻马店为代表的豫南地区，由于临近楚文化中心，秦墓在文化特点上又表现出较多的楚文化面貌。突出表现为陶室坑土使用五花土与白膏泥，墓中设置有边厢，秦墓中出现一定数量的高足楚式圈足及楚式平瓦盘。

秦汉时期是帝国时代的初创阶段，也是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东汉洛阳城继承了秦咸阳城、西汉长安城的多宫制布局，宫殿遗址主要为南齐、北齐、二宫城，均以皇城东西之中心，形成都城的“坐北朝南”方向。此外还继承了西汉长安城12座城门，“一门三卫”制度，遵循“面南背市”之制，如南齐东北角有太仓、武库，西北部设大市称金市。东汉洛阳城内和郊外也有整套的礼制建筑，“左祖右社”设置的宗庙和社稷。东汉洛阳城开启的都城布局形制在魏晋洛阳城得以确立并发展，对后代都城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洛阳城改变了西汉长安城多宫城的“二元政治”布局，帝陵合葬制度也由西汉帝陵的帝后同茭不同穴变为帝后同穴

中心，其考古学文化对周邻地区形成很强的辐射作用，对周邻地区甚至遥远地区考古学文化有着深远的辐射。同时，殷商文化中也有部分来自白北(西北)、西(西南)、南(南)、东(东南)等地的文化因素。

商王朝对西方的扩张主要目的是获取和运输资源。以陕西东龙山和老牛坡为代表的遗址明显与秦岭山区的铜矿及其他资源有关。晋南地区盐业生产在二里头上层时期得到开发，可能与商王国成功地向东方向扩张，在洛南地区控制了新的盐产和其他海洋资源有关。李家庄类型的发达及对岳石文化的同化，可能反映了商人为得到洛南地区自然资源特别是海盐及对东部边疆的殖民活动。对南方的扩张主要目的是获取长江流域丰富的金属矿资源。发现有商人开发的江西瑞昌铜岭和湖北丰富的麻城绿山铜矿。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鲁西大辛庄和鲁西南的一些遗址均是设置在通往重要资源交通线路上的枢纽。东下冯都城靠近盐池，盘龙城城郊邻近铜矿，潁城和城、垌曲城和新郑望京楼城则分别位于通往北方、西北方和南方的交通要道上。

商人对周边地区的扩张、融合与交流，体现出商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周边地区亦对商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商文化和周边地区的交流方式多是战争背景下的资源掠夺、商业贸易、进贡等方式，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如盐业、矿业、海盐资源等。物质需求 and 战争诉求的不同，决定了商代民族群与周边外来族群文化交流方式的差异性，进一步反映出商文化内部文化面貌的多样性，社会文明化和复杂化程度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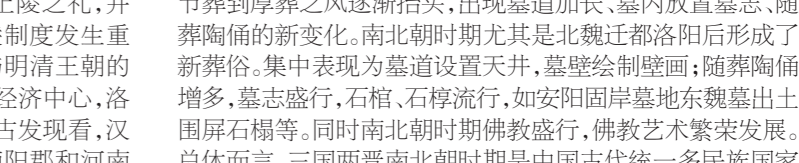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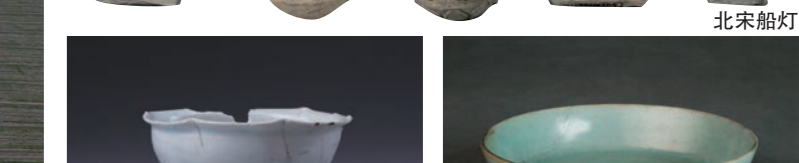
晚商时期，文化的分布中心转移至豫北冀南或鲁西等地，与之相应的商文化在晋西南、鄂东北地区亦出现了“逻辑或势力减弱的趋势。殷墟作为晚商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

窥探神器。中原文化对吴文化影响深远，以春秋时期大型墓葬为例，早中期流行随葬原始青瓷，但至晚期受中原礼制文化影响，开始普遍的随葬青釉礼乐器、兵器、车马器和生产工具，且多成套出现。同时，吴文化也在东周时期对中原施加影响，吴越地区刻纹薄胎白瓷铜器、吴越风格的戈、剑等，广泛发现于中原各商。考古资料显示，早期楚文化发展、发展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过风楼类型中常见中原中期地类型器物。文献载晋王匡高、楚曾参与，昭王征伐荆楚，身殒江汉。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之际，楚文化已逐渐强大起来，至春秋中晚期，发展成为江汉大国，沿着汉水流城，方城通道，淮水流城，兼并中原文化圈的曾、申、息等国，一路北上，争霸中原，饮马黄河。战国时期，西灭齐，东灭越，与韩、魏、秦、齐中原诸国纵横纵横。自春秋中晚期开始，楚文化中的青铜器日渐显示出与中国不一样的风格，独树一帜，河南浙川下寺楚墓青铜器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独特的前兆。至战国中晚期，河南黄河以南大部分领土为楚文化分布区。穴穴土坑墓中已有斜背墓道的设置，采用木板分割檸室，漆木器增多，龙足足方壶、浴缶等楚系墓葬出现于中原文化圈。

中原地区除了考古所见北方民族器物之外，不少或狄族群内西迁至中原腹地，河北行唐故都、伊川徐阳陆浑戎族墓、山西白鹤墓地、韩城梁带村刘家洼西陶家寨墓地、临海徐村墓地均可见到狄文化遗存，特别是位于东夷王畿附近的徐阳陆浑戎族墓地，表明华夏族与戎狄深度融合，仅从某些器物显示出狄族风格，整体风格已采用中原文化，体现了西周时期周边狄族民族不断融入中原文化圈的历史进程。是以华夏族为基础的秦汉统一大帝国内核。

秦汉时期是我国专制制时代发展的又—高峰。隋唐洛阳城由都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设置有南市、西市、北市”三市”和里坊区。是中国古代封闭式都城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成为中国最大的交通中心，为中国古代历史及其后历史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义北史梁陈采用“五音律”与以往传统的堪舆形成鲜明对比。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体现了融合了中原王朝传统与晋客大夫的情怀。北宋东京城，开创了新的街巷制底代替代了封闭式里坊制度，使社会各阶层进入—个新的时代并发展阶段。北宋东京城的布局对经中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布局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宋代物质文化代表符号—瓷器，宋代的五大名窑，中原地区占据其三，充分说明当时中原制造业的兴盛并对全国其他地区所起到的引领作用。

总体而言，中原地区在秦汉唐宋时期是国家的核心文化区，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区域。金元以降，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中原文化逐渐融入了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



节奏到寿养之风逐渐抬头，出现墓置棺槨、墓内放置墓志、随葬陶俑的新变化。南北朝时期又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形成了新葬俗。墓志盛行，石碣、石碣流行，如安阳固岸墓地东魏墓出土陶屋石碣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艺术繁荣发展。总体来看，同时南北两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姓氏文化在中原地区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外文化频繁互动，进而迎来了较之汉文明更为辉煌的唐文明。

隋唐时期是我国专制制时代发展的又—高峰。隋唐洛阳城由都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设置有南市、西市、北市”三市”和里坊区。是中国古代封闭式都城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成为中国最大的交通中心，为中国古代历史及其后历史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义北史梁陈采用“五音律”与以往传统的堪舆形成鲜明对比。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体现了融合了中原王朝传统与晋客大夫的情怀。北宋东京城，开创了新的街巷制底代替代了封闭式里坊制度，使社会各阶层进入—个新的时代并发展阶段。北宋东京城的布局对经中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布局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宋代物质文化代表符号—瓷器，宋代的五大名窑，中原地区占据其三，充分说明当时中原制造业的兴盛并对全国其他地区所起到的引领作用。

总体而言，中原地区在秦汉唐宋时期是国家的核心文化区，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区域。金元以降，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中原文化逐渐融入了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